

冷战时期苏联对美国 and 西方政策演变的几个阶段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关贵海

一、苏联改变对西方的看法与冷战的开端

1. 苏联也曾有妥协设想

在战后最初的几个月里,苏联曾力图使自己的国际形象更具有和平、妥协、愿意与反法西斯阵线盟友合作的特征。其原因可以归纳为4点:一是苏联在战后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迅速上升,苏联经历了十月革命后长期的孤立,感觉到了融入国际体系的好处;二是英法德等老牌大国在二战中均受到了严重创伤,实力大不如前。苏联认为自己有机会与美国携手共同主导世界事务;三是苏联自身的经济也遭到了重创,需要一个较长的和平时期以恢复元气;四是核武器因素的作用。苏联既要考虑美国拥有核武器,又要不遗余力地获得自己的核武器。

基于上述考虑,苏联方面在1948年以前,基本上保持了斗争与妥协并行的立场。例如,在对伊朗、土耳其问题持强硬立场的同时,苏联在战后很快撤出了驻中国东北和丹麦的军队,大幅度裁减军队,同意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立大会,在组建东欧亲共政府问题上的态度谨慎等等,甚至有学者认为斯大林在“投降”,在执行“绥

· 743 ·

靖”政策。^①

在被公认为冷战核心问题的德国问题上,苏联甚至在1947年秋还有着妥协的打算:苏联愿意接受西方提出关于统一德国的政治未来构想,包括放弃一党制,让德国社会民主党进入苏占区,乃至停止1946年建立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活动,以换取西方同意苏方关于赔偿方式的主张,即把德国正在生产的产品出口到苏联。斯大林首先关心的是德国的浓缩铀。因此可以看出,斯大林的妥协是有明确目的的,那就是最终打破美国的核垄断。

2. 斯大林改弦易辙

尽管苏联方面一再妥协,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并没有按照斯大林希望的那样给苏联和平发展经济,特别是核武器的机会,让斯大林接二连三地失望。

虽然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波茨坦会议上国务卿贝尔纳斯在四国外长伦敦理事会因自己拥有核武器而大显嚣张,但在1945年12月的莫斯科外长理事会上,贝尔纳斯向苏方提出了在核能领域进行合作的建议,给了苏联一线希望。

但是,美国很快就反悔了,并相继采取了与苏联在核领域“不合作”的三个“连环步”:一是在1946年2月3日有意泄露出关于苏联“核间谍”案的消息,并开始了相应的新闻战,意在暗示苏联,你什么核机密也得不到,也不会与你进行核领域的合作。二是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其实质就是在反苏基础上的英美核合作,从根本上违反了贝尔纳斯的莫斯科声明。三是1946年4—6月在制定德国非军事化协议草案时做文章。乍一看上去,该协议与核计划没有任何联系,但美国方面在其中加上了非常不显眼的一条内容,即严禁在德国生产的产品清单中有‘所有裂变材料’,生产这样的产品必须经过最高签约方(包括美国——本文作者)认可。这只能被理解为美国百般阻挠苏联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更不要说合作与支持了。

理论上讲,美国如此刁难苏联,斯大林理应给予激烈批评。但是,我们发现,虽然苏联对丘吉尔的演说和对贝尔纳斯的失信所给予的批评中只字未提核计划问题,而斯大林大讲苏美战后合作的1946年2月2日讲话与2月9日完全不提核合作可能性的讲话之间出现了巨大反差,则与核间谍风波有着必然的联系。必须指出的是,三次

回应均没有直接涉及核问题,并不意味着斯大林不在乎,而是他不希望苏联国内和国际社会对苏联发展核武器的计划过分关注。但斯大林对美国的失望是肯定的。

不过,让斯大林彻底失望的是西方完全排除了与苏联就核材料生产相关问题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还是在1947年3月四国外长理事会上西方就已经给了苏联相当明确的暗示:美国不怕苏联的核计划,但是不能容忍斯大林如此狡猾地在它的眼皮底下研制核武器,标志就是美国操纵、英国提出的反对把现产产品出口作为任何与德国问题相关协议的条件。^②但斯大林仍然心存希望,认为还有可能与美国达成协议。

然而,马歇尔计划彻底粉碎了苏联的期望。该计划要求接受国必须向美国申报出口产品清单,主要涉及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它们是向苏联提供浓缩铀的主要国家。这也就意味着苏联将不能再有保障地从东欧获得必需的核材料。诱人的援助和发展核武器之间的艰难选择让斯大林非常愤怒,当然他不可能放弃核计划。于是,斯大林对马歇尔计划态度极端强硬,并最终选择了让欧洲分裂成两个阵营的路线。

从此,已经不再有什么指望的苏联开始全面出击:痛斥西欧共产党人加入联合政府的做法;一改对捷克斯洛伐克中派政府的支持态度,将资产阶级部长们赶出了政府;在德国苏占区不声不响地取消了自由、普遍选举的口号,并把资产阶级代表赶出了政府;策划封锁柏林;在波兰召开部分共产党参加的会议,开始组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

对于苏占区当局采取的一些激进做法,苏联有关机构提出过不同看法。1948年春,率领苏共中央赴德专门小组的苏联著名外交官A. A. 索勃列夫就在自己的报告中激烈批评了苏占区当局的“极左”做法。在日期标志为1948年3月12日的便条中,苏联外交部欧洲第三司司长A. A. 斯米尔诺夫执着地建议首先应该召开新的德国问题外长理事会,而不要任由对抗性冲突发展。^③

然而,一旦斯大林的对抗路线确定,德国的分裂即已不可逆转。“柏林危机”是冷战中的第一次危机事件,使所有非对抗性的选择变得不再可能,而冷战也就成为了不可避免的事实。

二、苏联对美国和西方政策演变的主要阶段

苏联对美国和西方的政策是其冷战时期外交的主线演变过程可以分为全面对抗、缓和与对抗并存、全面进攻和战略收缩四个不同的阶段。

1. 全面对抗

德国问题是冷战的核心问题之一。苏联对西方采取强硬措施也是从德国开始的。尽管二战结束后苏联与美、英、法在德国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严重分歧,但基本上维持在可以和平解决的范畴内。然而,从1948年春季开始,苏联单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激烈行动,封锁柏林便是其中之一。

封锁柏林的直接原因是1948年2月美、英、法三国副外长伦敦会议决定将三方所占德国部分实现统一,旨在建立联邦德国,意即分裂德国。为表示强烈抗议西方的行为,苏联在1948年3月20日宣布退出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并决定从4月1日起检查所有通过苏占区的美国人的证件,检查所有货运和除私人行李以外的所有物品,随后宣布对西方国家进入柏林的通道实施交通管制。

美国对苏联的封锁行动作出了强硬的反应。一方面动用大量空军力量运输柏林西方占区的生活物资,而且还对苏占区实施反封锁,甚至把B—29轰炸机派往英国,摆出了一副决一死战的架势。这就是柏林封锁,也称第一次柏林危机。

柏林封锁是冷战时期东西方之间最严重的冲突事件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表面上极其强硬,但是苏联并没有真正要与美国交手的意思,也就是说,封锁行动更多是一种姿态,表示苏联强烈反对成立联邦德国,因此也为妥协解决问题留下了余地。这表现在苏联并没有控制柏林的空中通道,也没有放弃暗示美国,是要推迟成立联邦德国并让有苏联参加的四方外长会议来决定。因此,经过秘密协商,1949年5月5日,四国同时宣布解除封锁,并于5月23日在巴黎举行四国外长会议。

第一次柏林危机是苏联有意图的冒险行为,其结果一方面表明

美国当时没有与苏联直接发生军事冲突的打算,但也使西方对苏联的威胁有了更具体的认识,并加快了德国分裂和北约建立的步伐;而北约的建立又导致了华沙条约组织的成立。

如果说封锁柏林是苏联与西方第一次直接冲突的话,那么朝鲜战争则是第一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军事冲突,只不过这一次苏联没有直接出面,而是站在中朝两国的背后。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时,美苏两国商定以北纬38°线为界,朝鲜北部由苏联受降,南部由美方受降。同年12月,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达成了朝鲜未来统一和建立政府的协议,并决定由美苏组成联合委员会提出政府方案,提交苏、美、英、中四国审议。但是,除朝鲜劳动党外,朝鲜国内各派均强烈反对莫斯科协议。在美苏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苏联代表坚持只与支持莫斯科协议的派别接触,而美国认为应该同所有党派协商。在第二次会议上,本已与所有现在支持莫斯科协议党派达成协商共识,但苏方代表后又改口只同意与以前支持莫斯科协议的党派协商。在联合委员会工作陷入僵局的情况下,美国将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大会。1947年11月14日,联合国建立了朝鲜问题临时委员会,以监督朝鲜的选举。由于苏联反对建立该委员会,并不允许其成员进入朝鲜北部,联合国宣布朝鲜选举在联合国代表可以工作的地方举行即为有效。于是,1948年5月10日,朝鲜南部举行了选举并建立了韩国,而北部也在同年9月9日宣布建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由于美苏在朝鲜各有自己的战略考虑,朝鲜分裂变成事实。

苏联的地缘战略考虑是,要在远东地区建立自己的控制区,以抵御来自美、日的威胁。为此,苏联曾在朝鲜花大气力建立自己的监控体系。具体做法包括是苏联驻北朝鲜大使本人就是苏军上将;在朝鲜设立了包括克格勃在内的五个部门的代表处;有约200位朝裔苏联人在朝鲜国家机关工作,使每个部委至少有一位副部长是朝裔苏联人;派遣大批苏军专家到朝鲜等等。虽然苏军在1948年12月撤出了朝鲜,但在这样的条件下,苏联显然是知晓北朝鲜的行动计划的。由于担心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斯大林曾反对北朝鲜的武力统一计划。

但,在1950年初,斯大林的态度发生急转,支持了金日成的计划。对斯大林态度转变的原因,尚无明确和统一的说法,但有四点因

素值得关注:一是金日成确有公关艺术,在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用一方压另外一方。例如,在取得了毛泽东的支持后,他在斯大林仍犹豫时就讲道,难道您还不如毛泽东革命吗?这句话让斯大林无路可退。二是苏联有关部门认为,如果北朝鲜开始武力统一行动,会在各处出现人民起义,使军事行动能够迅速结束,美国干预的机会将大大降低。三是苏联对美日可能的接近忌讳莫深,认为中苏同盟再加上统一的朝鲜会对苏联的远东安全更为有利。四是美国国务卿艾奇逊1950年1月12日在华盛顿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的讲话中没有把朝鲜列入美国的“防御地带”,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斯大林对美国干预的担心。

然而,美国的反应却大大出乎斯大林的预料,不仅因为美方参战并利用苏联缺席的机会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使北朝鲜速战速决的设想成为泡影,而且美国还咄咄逼人地要求苏联对朝鲜的行动做出明确表态。

苏联不仅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且还在北朝鲜军队遭到挫折和中国志愿军参战的情况下,使自己的军人介入了战事,只是装扮成中国或北朝鲜的军人而已。据俄罗斯和西方的研究者声称:曾有大约5000名苏联军官与中朝官兵并肩作战。甚至有一种说法,就是当敌军逼近时,苏联军官不得不把负了重伤又无法送走的战友忍痛活埋,以免被敌方认出其真实身份。

美国对苏联的暗中介入非常清楚,因此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1951年5月31日和6月5日两次安排凯南与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马立克会面,试探苏方对和谈的看法。马立克表示苏联支持和谈,但建议美国与中国和朝鲜谈。

1951年7月10日,以美韩为一方、中朝为另一方开始了停战谈判。谈判的主要难题是战俘遣返问题。中朝坚持全部遣返,而美国则主张自愿遣返,双方僵持不下。

只是到了1953年春,由于美苏两国领导易人后,事态才出现了转机。取代杜鲁门当选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在访问南朝鲜时表示希望尽快结束战争;而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新的领导人也希望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敦促中朝早日缔结停战协定。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火协议得以签署。

历史事实表明,苏联在德国或朝鲜问题上一直在与西方,特别是

美国发生着严重冲突。但是,由于自身实力的局限,苏联要么避免直接出头与美国对峙,要么就是在美国立场强硬时采取退让,因此形成了冷而不战的局面。

2. 缓和与对抗并存

赫鲁晓夫上台执政,为苏联同西方关系,特别是与美国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契机。他在苏共二十大报告中就明确强调:“为了巩固全世界的和平事业,确立苏美两个世界最大国家之间牢固的友好关系具有重大意义。”他认为,就重大的国际问题同美国领导人进行对话并达成协议,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他在著名的1959年第涅伯彼得罗夫斯克讲话中指出:“我国与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如果是其他国家之间打起来的话,还有可能拉开;可要是美国与我国之间发生战争的话,别人谁也制止不了它。这将是巨大规模的灾难。因此,应当付出一切努力,力求在舍弃战争的情况下解决现有的争议问题……”^④

赫鲁晓夫不仅在指导思想上倡导缓和,在实践上也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步骤。

首先,在和平共处指导思想作用下,苏联在1955—1957年间把自己的军队数量裁减了214万,以示“苏联力求促进裁军计划的实际实施”。^⑤

其次,主动与美国接近,并在1959年9月实现了对美国的突破性访问以后,大力宣传所谓的“戴维营精神”,即一切没有解决的国际问题都不应当通过运用武力的办法来解决,而应当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赫鲁晓夫还试图通过禁止核试验条约谈判与美国联手建立核垄断,其中有明显限制中国的意味。

再次,苏联大力改善同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先后与奥地利缔结和约,与西德建交,与日本恢复邦交,并同意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放弃对日赔款要求、在缔结对日和约后交还齿舞和色丹两岛。

但是,在赫鲁晓夫与西方缓和关系的同时,冷战两个阵营之间对抗的激烈度在间歇性地增强。1960年5月1日苏联防空军击落了美国的高空侦察机,即U-2飞机事件,它使随后举行的美、苏、英、法四国会议流产,证明了苏联的缓和战略的脆弱性。

第二次柏林危机与柏林墙的出现是苏联在作为冷战核心问题的

德国问题上由攻转守的转折点。战后西欧国家,特别是西德的经济恢复迅速,对东德产生了巨大吸引力,引发了大量东德人(包括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经过西柏林逃往西德的事件。因此,苏联在自己的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逐步赶上美国的情况下,企图把西方力量赶出西柏林,一劳永逸地解决东德乃至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问题。于是,苏联在1958年11月27日向西方主要国家发出了照会,声称苏联准备与东德签约交回柏林,并建议美、英、法三国也将自己在西柏林的驻军撤走,期限为6个月。否则,苏联将单方面采取行动。同年12月31日,美国拒绝了苏联的建议,柏林地位问题再一次把冷战双方置于热战边缘。

在持续了近3年的第二次柏林危机中,苏联并没有放弃通过妥协解决问题的考虑,最终还是采纳了东德领导人封锁边界以阻止其国人西逃的建议。于是,1961年8月17日,一道有名的“柏林墙”出现在东、西柏林之间,直到1990年两德统一。

与柏林危机相比,古巴导弹危机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危机,因为它是冷战时期美苏之间最严重的一次直接对抗,是“核战争边缘”式的冲突。

1959年1月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取得胜利,美国则试图以武力推翻古巴新政权。为捍卫新政权,古巴选择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根据1962年8月达成的苏古秘密协定(并未正式签署),苏联向古巴运送了42枚中程导弹、伊尔—28轰炸机等防卫武器。苏联此举的目的既有利己的一面,即改善苏联与美国战略力量对比关系;也有利他的一面,即保护古巴不受美国侵略。有学者认为赫鲁晓夫在古巴制造危机是为了分散美国对欧洲的注意力^⑥;但也有学者认为苏联在德国和柏林问题上向美国施加压力是为了掩护向古巴运送导弹的计划^⑦。笔者认为,这恰好证明赫鲁晓夫决策本身缺乏准确依据和周密考虑。

由于古巴离美国本土最近只有大约90海里,习惯于海洋天险保护,又拥有最强军事实力的美国不可能容忍苏联的威胁,因此肯尼迪政府选择了极其强硬的“战争边缘政策”,即强行对古巴实施“隔离”,不惜以武力与苏联一决雌雄,迫使苏联把导弹和轰炸机撤出古巴。苏联也摆出一副决不让步的架势。

但是,苏联并没有预料到美国会如此强烈应对,更没有准备好与

美国在古巴打一场战争。因此,经过秘密渠道反复磋商,美苏就古巴导弹问题达成了妥协,即苏联从古巴撤走导弹和飞机,而美国则承诺不侵略古巴。1962年11月20日,在苏联撤出导弹和轰炸机以后,美国解除了“隔离”,危机得以解除。

古巴导弹危机是苏联冷战时期外交中所犯的最大的战略性错误。第一,没有正确认识到苏联与美国的战略力量差距;第二,在美国反应强烈的情况下,没有周密的应对方案;第三,声称保卫古巴却在撤出导弹时全然不顾古巴领导层的意见,使苏联的国际威信大受贬损。

当然,古巴导弹危机也带来了一些积极的结果。例如,美国毕竟公开承诺不侵略古巴;美苏开始以“热线”电话等方式建立危机协调机制;双方加快了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步伐。

3. 全面进攻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一方面继承了赫鲁晓夫的既与西方对话,又与西方对抗的路线,即在加快发展自己的战略力量,以求与美国均势的同时,大力推进裁军谈判进程;另一方面不失时机地利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遇到的困难推行全面进攻的战略,在全球范围与美国一争高低。因为美国在越南陷入困境,证明美国也不是无所不能的。用俄罗斯学者的话说,正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外交政策才真正具有了全球性。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外交政策的全球性主要体现在,苏联从军事实力上真正成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世界超级大国;与美国在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在进行着争夺,而且不再像赫鲁晓夫时期那样临危而退,因为苏联取得了与美国的核力量均衡。它清楚美国不会冒自杀的危险使用核武器遏制自己的扩张,而在常规武器方面,苏联当时是明显处于优势的。此外,苏联与美国主导了从裁军到发展问题的主要国际机制,特别是双方共同建立了限制军备机制(如1972年的限制导弹防御系统的条约)和欧洲安全机制(如1975年成立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

勃列日涅夫外交的进攻性表现在苏联加强了与美国在第三世界的争夺,加紧了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控制,加速了军事现代化的步伐。

在承认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攻势外交使苏联真正成为世界超级大

国的同时,也必须指出,正是由于苏联在1970—1974年间在第三世界展开大规模的攻势,才迫使美国转而寻求与中国联手遏制苏联的扩张,给苏联的全球战略带来了巨大压力。

4. 战略收缩

正是出于对苏联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有限性的认识,戈尔巴乔夫执政一改勃列日涅夫时期在与西方关系上的进攻战略,在所谓外交新思维的口号下,实施全面收缩的国际战略,通过大幅度和单方面削减武器和同意德国统一,换取了与西方关系的缓和和合作,但也葬送了自己的权力、自己的国家。

戈尔巴乔夫认为是过度的军备竞赛使苏联的经济奄奄一息,要想摆脱困境,必须放弃同美国的军备竞赛。当然,最好是拉上美国也多少裁减一点战略武库。在坚持让美国把削减中导问题与停止其战略防御计划挂钩的要求难以实现以后,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12月第一次访问美国时,就与里根总统签署了中导条约,表明苏联同意同时销毁部署在欧洲和亚洲的全部中程导弹;而美国则相应地销毁潘兴—2型导弹。1988年12月,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苏联将单方面削减军队50万人,置苏军高级将领的告诫于不顾。1989年9月,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访问美国,再次在军控问题上做出一系列让步。例如,不再坚持将削减核武器的谈判与反导弹防御问题联系起来等。

在德国统一问题上,戈尔巴乔夫立场的退却也是非常明显的。在1989年底,他还曾经表示两个德国的存在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并提醒说不要忘记东德是苏联的盟国,不容许别人干涉其内政。但是,柏林墙的倒塌使他意识到统一趋势发展的迅速程度,于是在1990年初又表示东德有权统一,但是必须保持中立,不能加入北约。戈尔巴乔夫曾幻想能够借两德统一的机会改造北约和华约,以抵消两德统一给苏联带来的消极影响,但他考虑的也主要是形象上的影响。问题是,苏联领导层在与德国谈判的过程中,非常清楚地表示出希望为从德国撤走苏军而获得相应补偿的意图。于是,1990年7月,当西德总理科尔在莫斯科会谈中允诺给予撤出苏军120亿马克的补偿,并答应向苏联提供300亿美元经济援助时,戈尔巴乔夫的防线彻底瓦解了。他同意德国无条件统一,不再就新德国是否加入北约的问题

提出任何限制性条件。回想一下苏联红军为攻克柏林所付出的生命和鲜血、冷战开始后苏联为德国问题所承担的风险和国际压力,就不难发现,戈尔巴乔夫的决策有多么不负责任。他用全苏联的代价换得的是德国人对他个人的感激和欢呼。

综观冷战时期苏联对西方政策的演变过程,我们不难发现,第一,苏联的政策演变是呈波浪型的,是受美国政策,苏联国力变化等因素影响的;第二,演变方向更多取决于少数上层领导人,即没有广泛的民意基础,也缺乏充分的科学论证;第三,苏联与西方特别是美国联手主宰世界的思路一直比较明显,反映出其大国主义传统的牢固性。

冷战已经结束,但冷战的遗产还需要相当长的时期来消除。今天的俄罗斯似乎还再有意无意地重复着苏联的老路,但我们不妨仔细观察。

【注释】

① Harbutt F. American Challenge. Soviet Response; The Beginning of the Cold War. February — May 1946

②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981 — 1982. Vol. 96, No 26, pp. 634—635.

③ Deighton A. The Impossible Peace. Britain, the Division of German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Oxford.

④ A. M. 菲里托夫:《德国问题:从分裂到统一》,莫斯科 1993 年俄文版,第 104 页。

⑤ 苏共 20 大大会录音记录,第 1 卷,第 31 页。

⑥ [苏]尼·赫鲁晓夫:《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世界》第 1 卷,莫斯科 1960 年版,第 506 页。

⑦ 《苏联武装力量》(答问录),莫斯科 1987 年俄文版,第 348 页。